

第五章

西藏人口和西藏人权

李坚尚

一个地区的人口状况是衡量该地区人权状况的一项重要内容。西藏自和平解放以来，由于生产的发展、经济的增长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西藏人口的发展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这种情况说明，西藏人权状况在人口问题上也是在不断改善的。但在国外的某些出版物中，却别有用心地诬蔑中国政府在西藏实行“种族灭绝”的政策，并以所谓节育、堕胎、绝育以及杀婴等问题上进行了违背实际的指控。这是经不起客观事实检验的。美国人类学家梅尔文·C. 戈德斯坦以实地调查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据进行了澄清，并明确指出，西藏自治区实际上正处在一个高出生率阶段，而并不存在一个导致人口下降和威胁藏族人继续生存的所谓强制性严厉控制人口的政策。^① 戈德斯坦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客观的、值得称道的。事实上，西藏的人口不是所谓的“灭绝”，而是逐步兴旺。本章拟就西藏人口的增长及相关问题加以论述，就西藏的人权改善状况再作分析。

^① 梅尔文·C. 戈德斯坦、海森著，海森译：《中国在西藏自治区实行的节育政策》，见《民族译丛》1993年第3期。

第一节 西藏人口现状与 人权的改善

和平解放以后的西藏人口是否不断增长，这是我们首先要弄清的问题。因为人口的增长首先意味着民族的繁荣而不是灭绝，这是一般人都能理解的常识。从世界漫长的历史发展显示，凡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的时代，人口就会增长，而一旦民族纷争迭起、社会冲突加剧、时疫流行，人口就会减少。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人口的增长，是人权状况改善的一个重要标志，尤其对西藏这个人口长期处于下降趋势的地区来说，更是如此。1953年我国作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由于当时西藏仍在旧地方政府噶厦的统治之下，没有具备人口普查的基本条件，中央政府只好尊重噶厦政府申报的数字，即100万，作为西藏人口的基本数量。到1964年进行全国人口普查时，西藏已按规定的程序进行普查，确切的数字为1214508人，其中藏族人口占97.07%即1178923人；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全西藏人口1772239人，其中藏族人口占95.1%，即1685399人；1990年第四次普查时，西藏人口为2114793人，其中藏族占96.3%，即2036546人。我们从这些统计数字看到，从1953年至1990年的37年里，西藏人口增长了一倍多，其中1953年至1964年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0.7%；1964年至1982年的18年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8%；1982年至1990年的8年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6%。从这四次人口普查的增长率情况看，那种指责中国政府在西藏实行种族灭绝的政策，是毫无根据的，是别有用心的。

西藏人口的增长率从1953年起在不断提高，其中1964年至1982年的18年间增长率最高，达到年增长28%，只是到1982

年至 1990 年间人口年增长率才有所减缓。这种减缓，是与全国大力倡导晚婚晚育，优生优育的氛围相协调的。尽管如此，西藏藏族人口的增长率，自和平解放以来的 37 年里，比其他民族，特别是比汉族的增长率高。1953 年至 1964 年这一时期，汉族人口平均增长率为 16.3%；朝鲜族增长率 16.4%，西藏藏族增长率 10.7%；其增长率比起汉族和朝鲜族稍低，而 1964 年至 1982 年这一时期为例，汉族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为 2.04%，朝鲜族为 1.54%，这与西藏藏族年增长率 2.55% 相比，后者的增长率高出 25% 和 66%。^① 1982 年至 1990 年这一时期，汉族人口平均增长率为 1.37%，朝鲜族为 1.09%，这与同期西藏藏族人口年增长率 2.42% 相比，后者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高出 76.6% 和 105.5%。我们从这四次人口普查的数字看到，除了 1959 年因叛乱事件，数万名普通群众受蒙骗、裹胁外逃，致使人口统计的增长率稍低外，其余年限西藏藏族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都比汉族和朝鲜族高出 25% 以上，其中最高的达到 105.5%。这些情况表明，和平解放以来，西藏人口不是减少，更没有灭绝，而且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其增长速度是相当快的。

有关西藏人口增长的情况，我们从实地调查的资料也同样得到证实。1993 年在堆龙德庆县收集的有关人口数据显示，该县 1959 年的人口为 19200 人，1964 年时为 22574 人，1982 年为 29970 人，1990 年为 32653 人，1992 年为 33581 人。在 33 年中，人口增加了 14381 人，为 1959 年人口的 74.9%，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为 2.27%。作为人口比较稠密的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和年楚河流域的 18 个县市，1982 年至 1990 年的 8 年间，人口也从 696529 人增至 798577 人，年增长率也平均为 1.83%，同

^① 参阅张天路等：《中国藏族人口的发展变化》，见《中国藏学》1988 年第 2 期，第 6 页。

样也比汉族和朝鲜族高。

西藏人口的增加，具有重要的意义。众所周知，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历史上西藏人口长期处于停滞甚至下降的趋势。据有关资料记载，公元 1737 年，西藏人口以达赖、班禅辖区的人数约计为 96 万。^① 若加上不属达赖、班禅辖区的昌都地区和部分那曲地区，人口已过 100 万，经历 200 多年的漫长岁月，直到 1953 年，西藏人口也没有多大的增长，但和平解放后的三十多年即到了 1990 年，人口已增至 209.6 万，比 1953 年噶厦政府提供的数字增加了一倍，从而扭转了西藏人口长期处于停滞甚至下降的趋势，标志着西藏人口走上了兴旺发展的道路。古今相比，那些“西藏种族灭绝”的谎言，不攻自破。

第二节 西藏人口繁荣的原因

西藏人口增长的速度，就全国各族的情况而言，还是比较快的。为了进一步对这一问题作更深层次的分析，我们就影响人口增加的若干因素，如生育率、婚育年龄和死亡率方面作扼要的论述。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显示，西藏人口增长速度较快，首先表现在西藏妇女的生育率比全国妇女的平均生育率高。据 1990 年西藏第四次人口普查 10% 提前抽样调查所获得的资料显示，1989 年西藏育龄妇女的生育率为 120.62%，而 1987 年全国育龄妇女抽样调查的生育率为 73.4%，两相比较，西藏妇女的平均生育率高出全国妇女平均生育率的 47.22%。若从育龄段来看，从 15 周岁至 49 周岁的 35 个年龄段统计，除了从 20 岁至 25 岁这 6 个年龄段外，其余 29 个年龄段的生育率均以西藏妇女为高。若以

^① 黄奋斗：《西藏史略》，民族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64 页。

生育率为 100% 以上的年龄段为准，西藏妇女从 20 岁起至 42 岁止仍然保持这一水平，多达 23 个年龄段，而全国妇女仅局限在 20 岁至 29 岁这 10 个年龄段，西藏妇女又比全国妇女多出 13 个年龄段，具体情况请看下表。^①

年龄(岁)	西藏(%)	全国(%)	年龄(岁)	西藏(%)	全国(%)
15	2.29	0.2	33	163.69	51.1
16	3.99	1.6	34	162.65	37.1
17	16.63	7.9	35	172.04	30.7
18	33.35	27.1	36	150.00	24.3
19	70.49	64.4	37	136.59	18.1
20	110.77	126.5	38	134.04	14.9
21	155.49	206.1	39	110.51	11.3
22	174.00	249.9	40	134.91	9.5
23	203.57	271.3	41	110.71	6.9
24	218.33	290.4	42	106.21	6.5
25	223.32	237.9	43	70.16	3.9
26	233.01	181.8	44	50.66	2.7
27	197.741	172.9	45	36.06	2.7
28	201.51	137.0	46	29.06	2.1
29	202.90	121.5	47	26.42	1.0
30	194.85	96.7	48	12.03	0.5
31	180.09	78.5	49	11.01	3.7
32	182.65	70.3	平均	120.62	73.4

资料来源：转引自藏族人口科学讨论会论文：《西藏人口婚姻生育形势分析》，陈华著。

我们从上述表列的情况看到，西藏妇女在生育率与全国妇女

^① 此表原系陈华所制，转引自扎呷等：《浅谈藏传佛教对“一江两河”流域人口的影响》，见《西藏研究》1994 年第 1 期，第 41 页。

的平均生育率相比就总体来说是高的，这种状况，当然使西藏人口的增长率较全国高，另一方面，我们从西藏一些地方妇女不同年龄组的终身生育率的递增状况也同样能说明西藏人口的必然增长。据有关人士 1981 年调查，拉萨城关区 40—49 岁年龄组的妇女，累计生育率为 4.59 个；50—59 岁年龄组的妇女，终身生育率为 4.20 个；60—64 岁年龄组的妇女终身生育率为 3.67 个，在乃东县的妇女中，40—49 岁年龄组的妇女，累计生育率为 4.51 个；50—59 岁年龄组的妇女，终身生育率为 4.86 个；60—64 岁年龄组妇女，终身生育率为 3.58 个，请看下表：

1981 年西藏地区生育率情况

地 区	累计生育率 40—49 岁	终身生育率	
		50—59	60—64
拉萨城关区	4.59	4.20	3.67
乃东县	4.51	4.86	3.58

我们从上表看到，随着年龄组的年龄下降，妇女的累计生育子女数就越高，如拉萨城关区 40—49 岁年龄组的妇女，平均生育孩子的数目，分别高于 50—59 岁年龄组和 60—64 岁年龄组的 17.9% 和 34.9%，表明拉萨城关区 40—49 岁年龄组的妇女生育能力，已超过 50 岁以上年龄组的妇女生育能力，若考虑到这一年龄组的妇女还没有完全进入绝育期，尚具一定的生育能力，那么当她们到结束生育时，所生子女数定将增加。乃东县的妇女亦存在着同样的生育增加的趋势。应该看到，1981 年统计时为 40—49 岁年龄组的妇女，出生于 1932—1941 年，1950 年西藏和平解放时仅为 9 岁至 18 岁，到 1959 年民主改革时进入 18 岁至 27 岁，她们的生育期基本上在民主改革以后；而 50—59 岁的年龄组的妇女，她们旺盛的生育期，在较长的时期是在民主改革以

后；而 60 岁以上的年龄组的妇女，她们的生育旺盛期全在民主改革以前，我们从这些不同年龄组妇女生育状况的变化看到，民主改革以后，西藏妇女的生育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这不仅说明了西藏人口有较大增长的因素，同时也说明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妇女生活改善后，体质有了提高，生育能力也有所增强。

促使西藏人口增长的另一个因素是初婚年龄的下降。民主改革以前，作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牧民，由于乌拉差役沉重，生活贫困，组织家庭不易，故一般说来，初婚的年龄都较大。据 1982 年调查，乃东县农村 60 岁以上和 50—59 岁妇女的初婚年龄，平均为 24.0—24.1 岁；而 40—49 岁和 30—39 岁年龄组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下降为 23.3 和 21.2 岁；30 岁以下年龄组的妇女，初婚年龄再降至 21.0 岁。拉萨市妇女的初婚年龄，也分别由 24.8 岁和 23.2 岁，下降至 20.4 岁和 21.5 岁，而 30 岁以下年龄组的妇女，也下降至 20.6 岁。^① 这种结婚年龄的下降，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但生活重担的减轻，经济状况的改善和生活的安定，无疑是主要的原因。

西藏妇女初婚年龄的提前，生育率的提高和婚育妇女平均子女的增加，其直接效果是西藏人口出生率的提高。依据 1970 年至 1990 年的历年出生人数统计，西藏人口从年出生 3.78 万人开始逐年递增，至 1989 年达到 5.17 万人，年出生率也基本上稳定在 21‰ 至 25‰ 之间，均比全国的平均出生率高。由于基数的不断扩大，即使出生率有所下降，但出生的人口数量基本上呈上升趋势，如 1973 年的出生率为 25.39‰，是 20 年来最高的，但其实际增加的人数为 4.09 万人；而 1990 年的出生率有所下降，为 22.63‰，但出生人口却达 4.91 万，比 1973 年多出生 8200 人，

^① 王克、赵学董：《西藏藏族的人口现状和家庭类型》，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 年第 4 期，第 93 页。

西藏人口的出生率时有下降，但总的说来，出生人口的绝对数字在不断上升。据近 21 年统计，西藏人口出生累计已达 92.4 万人，相当于 1971 年西藏总人口的 59.5%，是 1953 年总人口的 92.4%。

西藏人口在出生率增高的同时，人口死亡率却不断下降。1970 年时，死亡率为 10.16‰，1971 年时降至为 9.85‰，经过 7 年即 1978 年时降至 8.75‰，再经 9 年即 1987 年降至 7.95‰，到 1990 年时，已低至 7.42‰，达到历年来的最低点。由于出生率的增加和死亡率的下降，从 1970 年至 1990 年的 20 年间，西藏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都保持在 13‰ 到 18‰ 之间的较高水准上。1990 年的自然增长率为 15.21‰，比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 14.39‰ 高 0.82‰，比自然增长率 3.67‰ 的全国最低点的上海高 2.29 倍。

促进西藏人口繁荣还有其他社会的因素，如政治的安定、经济的增长和文化的提高等，其中包括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作条件的改善、教育状况的好转，医疗卫生的改进、婚姻、家庭和谐和思想意识的变化等。这里不打算对此作全面的探讨，仅就医疗卫生领域中的妇婴保护和思想意识中的生育观点的变化再作分析。

在旧西藏，按照传统观念，妇女生育被认为是不洁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关心和爱护。一般妇女分娩时，不管是严寒的冬夜或风雨的白昼，只能在帐篷外或牛棚羊圈里进行，且生产过程多数都由产妇自行处理，没有助产人员。在西藏严酷的自然条件下，加上这样的生育传统，母婴的死亡率甚高是必然的。在和平解放前，据粗略估计，婴儿死亡率一般都在 288‰ 左右。和平解放以后，中央政府十分关心西藏母婴的健康。早在 1953 年，中央派遣的昌都民族卫生工作大队为藏民送药治病的同时，在当地举办医疗训练班，培养新法接生员 44 名，开创了西藏现代妇婴保护的先河。此后，随着西藏各地医疗机构的建立，

妇产科和小儿科先后设置，宣传和推广新法接生，难产救治和婴幼儿疾病的防治，妇女的产前检查和产后访视的服务工作也逐步开展。到 1977 年，全西藏已有经过培训掌握新法接生技术的农牧区卫生员 4379 名，接生员 1556 名，为普及新法接生，降低孕产妇、新生儿、婴幼儿的死亡率做了大量的工作。据 1987 年统计，全西藏已有医士、助产士以上的妇、儿科专业人员 366 人，对长期危害妇女健康的宫颈炎、阴道炎、附件炎等妇科疾病进行了有效的防治。新生婴儿的死亡率已从过去的 288‰ 降至 1985 年的 69.07‰，过去长期危害儿童健康的麻疹、百日咳已得到较好的控制。如 1980 年麻疹患者为 28594 人，死亡 254 人，至 1987 年，麻疹患者已降至 83 人，死亡仅 1 人。1994 年，西藏儿童免疫接种率已达 91%。西藏人口的平均寿命也从过去的 36 岁提高到 63.4 岁，儿童的平均身高和体重亦有较大的增长，医药卫生状况的改善和妇幼保健事业的发展，使人口不断增加。

西藏的社会变革导致生育观的改变，也是促使西藏人口增长的一个因素。长期以来，西藏普通群众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把人的一生视作是受苦受难的历程，而把幸福寄托在来世上，因而在婚姻、子嗣、家庭的观念上，并不像其他民族那样看重，加之西藏僧人比例大、佛教又禁止僧人结婚生子也影响西藏人口的增长。解放以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传播，人们不同程度地改变着自己固有的宗教观念，对现实生活越来越重视，特别是在农牧区实行自主经营后，人们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增长。据 1991 年日喀则地区白朗县玛乡抽样调查，为了解决生产分工的问题，有 51% 的家庭认为应当有 5 个子女，有 31% 的家庭认为应该有 6 个以上子女，仅有 18% 的家庭认为有了 2 个子女也可以，其中认为家里必须要有 2 个男孩才能满足的家庭占 91%，认为要有 3 个或更多的男孩的占 9%，也就是说，在被访

问的家庭中，全部都要 2 个以上的男孩才能满足家庭的需要。^① 我们从这则调查资料反映的情况看到，这种把家庭人口的多少同家庭经济收益多寡紧密联系在一起，与过去生育子女送到寺庙当僧尼为荣的观念已完全不同，这种生育观念的转变，意味着西藏人口潜在着迅猛增长的势头。

第三节 西藏人口素质的提高

西藏人口在不断增长，鉴于西藏自然环境的严酷，尤其是每人平均仅有 1.5 亩可耕地，而牧区畜、草矛盾日趋尖锐，草场难以满足牲畜数量增加的状况下，在西藏人口问题上，适当降低人口的增长速度，重点提高人口的素质，已成为改善西藏人权状况所面临的新课题。就目前的状况来说，主要是提高科学技术和文化水平，借以促进生产力的提高，推动西藏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自和平解放以来，中央政府在西藏已着手进行了大量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提高工作，促进了西藏人口素质的提高。

我们深切知道，西藏有独特的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藏族在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医学历算等众多学术领域内，都有自己的创造，并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但也不可否认，由于长期封建农奴制度的封闭性、排异性和等级制度的限制，使西藏的文化教育长期局限在寺院的范围内，因而在文化教育上存在两大缺憾：一是没有进行文化普及，文盲率高；二是基本上没有开展现代科学技术教育。在现代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发展的潮流面前，这种状况，显然是赶不上发展形势的。

^① 孙勇、巴桑卓嘎：《对西藏农牧区人口与经济的个案调查分析》，见《西藏研究》1993 年第 2 期，第 32—33 页。

事实上，西藏的这种人口素质不高的状况，早已引起国家和政府的关注，并采取多项措施，以补救历史留下的缺憾。据有关资料载，在和平解放西藏的 1951 年前后，西藏约有官办学校 20 多所，私塾 90 多所，在校学生约 3000 人，适龄儿童入学率不到 2%；90%以上的人口为文盲，没有现代科技教育。这种落后状态，难以推动西藏建设事业的发展，为此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采用就地培训，派往外地进修和引进外地人才的办法，培养和造就了大批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以满足建设事业的需要，从而在整体上使西藏人的文化科学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

首先表现在建立起具有相当规模的现代教育体系。到 1990 年为止，全区已有各类学校 2556 所，其中高等学校 4 所，中等专业学校 15 所，普通中学 63 所，小学 2474 所。各类学校在校学生总数为 184905 人，其中大学生 2025 人，中专生 4175 人，中学生 21303 人，小学生 157402 人。^① 这同和平解放前夕相比，学校增加了 23 倍，在校学生增加了 62 倍。我们撇开其他因素不谈，仅从学校和学生的数量就可以说明，近数十年来，西藏现代教育系统的建立，不仅把原有的教育体制从狭小的寺庙教育推向广阔的现代教育，而且对普及西藏教育，减少文盲率起着重要的作用。据 1990 年统计，西藏文盲率已从过去的 90% 降至 44.43%。这样使西藏的人口素质大大提高。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随着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西藏已具有一定数量的门类齐全的科学技术人员，据 1989 年统计，其总数已达 26799 人，其门类包括工程技术、农业技术、科学研究、卫生医疗、教学人员、新闻编辑、文媒体育、财贸经济、工艺美术等。工程技术人员已达 3474 人，其中高级工程师 96 人、

^① 《西藏社会经济统计年鉴》，统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92—395 页。

工程师 611 人、助理工程师 758 人、技术员 569 人；农业技术人员 1476 人，其中高级农艺师 19 人、农艺师 200 人、助理农艺师 535 人、技术员 379 人。这些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为推动西藏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仅以西藏自治区第四次科技进步奖为例，获奖项目 40 项，其中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4 项，三等奖 17 项，四等奖 15 项。一等奖中的《拉萨白鸡的培育》是自治区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所 8 位研究人员共同培育的，其中藏族的科研人员就有 6 人；《西藏麦锈病综合防治研究》是西藏自治区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所 7 位科研人员共同完成的，其中藏族人员 3 人。此外《西藏珍稀野生动物考察》、《藏 8202 制剂治疗山羊皮肤癌试验研究》等，均有藏族科研人员参与。在二、三、四等奖项的项目中，亦涌现了大批藏族科研工作者，这些人才的成长和壮大，改变了西藏长期以来在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众多学科中的空白状态，更显示出西藏人民文化科学水平和人口素质的提高。

农牧民是西藏社会的主体，提高他们的科学技术知识，并使之应用于生产和生活之中，是提高西藏人民的科技文化素质的重要方面。经过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的数十年不懈的努力，广大农牧民在这方面也有了可喜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下述诸方面：

一是接受现代教育已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长期以来，西藏人习惯把孩子送入寺庙接受宗教的教育，并以此为荣。当本世纪 50 年代现代教育在西藏土地上出现的时候，受到一些人的冷遇。还出现一些富裕人家庭请穷人少年替代其子弟上学的现象。后来事情才逐渐发生变化，随着现代科技知识在农牧区的推广和应用所带来的效益，尤其是接受现代教育的子弟毕业后，可以从事其他人所不能从事的工作，并得到了较农、牧业生产更丰厚的报酬，读书求学已成为人们向往的目标，即使是到很远的地方就读，也在所不辞。1984 年，中央政府根据西藏基础教育薄弱、

师资缺乏、建设人才缺乏等情况，决定在内地十六个省市的重点中学开设西藏班，挑选农牧民小学毕业生的优秀子弟前去就读。对于十多岁的孩子到遥远的地方上学，家长不仅不阻拦，相反还主动申请，一旦被选中，还往往看作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亲朋知悉，各自携酒前来祝贺；中选学生离家时，亦敬献哈达，相送于途，与过去入学的情景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现象，表现了西藏人对现代教育观念的转变。

二是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长期以来，西藏人民受到宗教观念的影响，把危害农作物和牲畜的害虫视作应当保护的生灵，不予消灭，严重影响了农、牧业的正常发展。随着科学常识的宣传和说服、教育工作的开展以及典型示范的逐步推广，牲畜除虫治病、草原灭鼠、品种改良、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化学肥料的应用、水电建设等多项现代科学技术已成为人们寻求农、牧丰收的手段。听天由命，因果报应的思想意识正受到冲击。可以说，广大农牧民的这种观念的转变，为西藏社会的现代化提供了思想基础。记得我们 1993 年在堆龙德庆调查时，农民向我们抱怨的是近年来化肥涨价太快了，牧民向我们抱怨的是近年来畜牧兽医到他们的牧场来得少了。我们从这种抱怨声中不是看到西藏农牧民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渴望吗？

三是对科学技术人才的重视。在西藏广大农牧民中，对实用性的科学技术甚感兴趣，特别是对他们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科学技术。1966 年建成的林芝毛纺厂，是由上海支援建设的，该厂的建设，不仅使西藏的羊毛有了出路，而且培养了一批西藏的纺织技术人员。山南地区进行一江两河的开发工程，先后从贵州和吉林省水利科学院聘请五名工程技术人员参预设计，随后选派 10 人去林芝农牧学院和吉林高等水电学校进修，作为这一工程的受益单位的穷结县，培训了乡村干部和技术人员 85 人次。即使是个体户和集体户的单位，也从外地引入人才，如堆龙德庆县

东嘎水泥厂，就以合资方式从甘肃永登县引入水泥厂兴建和生产的技术骨干，以培养自己在生产实践中需要的技术人才。在拉萨市和近郊地区的藏族经营者，也大量使用外地的汽车修理、餐饮技术、蔬菜种植、商业营销等技术和管理人员，显示了西藏人民对现代文化科学技术知识的渴望之情。

综合上述的分析我们看到，自和平解放以来，西藏的人口在持续增长，藏族人民的体质和文化素质在不断提高，西藏人口走上了一条兴旺发展的道路。西藏人口发展出现的这些新现象，有力地说明西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了基本的人权保障，享受着过去从未享受过的经济的权利、文化教育的权利和医药卫生的权利。一切正直的能正视西藏现实的人，是会看到西藏人权状况在这些方面的进步的。西藏同中国其他省市自治区一样，同样也有不足，也有缺憾，特别是西藏的基础设施差，困难和问题更多。这对于一个不断变革、不断探索、努力寻求适合西藏社会实际的建设方案的地方来说，是难以避免的现象。对此，凡关心西藏事业发展的人，都能正确地理解。在 1990 年有关人口普查公布的数字表明，在 10 万人中，全国平均有大学生 1422 名，西藏仅有 574 名，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40.4%；全国平均有高中生 8039 人，西藏仅有 2122 人，仅为全国水平的 26.4%；全国平均有初中生 23344 人，西藏仅有 3850 人，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16.5%；全国平均有小学生 37057 人，西藏仅有 18597 人，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50.2%。全国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 15.88%，而西藏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 44.43%，高出全国的平均水平 1.8 倍。^① 我们从这些数字看到，如果说全国在提高广大人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的话，那么在西藏，这项工作则更为艰巨，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为此，全国各族人

^① 《人民日报》1990 年 11 月 21 日公布的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民，特别是西藏各族人民应当同心协力，排除外来势力的干扰，逐步提高西藏人民的健康水平，努力使西藏人口从数量的提高逐步向素质的提高上发展，使西藏的人权事业持续不断地得到新的改善。